

《汉学研究学刊》第三卷（2012）

Journal of Sinological Studies, No. 3 (2012), pp. 239-247

书评

宋燕鹏著《籍贯与流动——北朝文士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保定市：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ISBN: 978-781097-935-1，427页。

孔祥军、何适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进入新世纪以来，创新意识被视为推动整个社会前行的重要力量之一，在各个领域被史无前例的加以强调。这种对创新的重视在学术界尤为显著，然而，究竟如何进行学术创新却很少得到明确而又坚实的回应。宋燕鹏博士新著《籍贯与流动——北朝文士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以下简称《籍贯与流动》），在古典文学与历史地理交叉视野下研究了北朝文士文学创作与籍贯流动之互动关系，可谓一次学术创新的有益尝试。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出现了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其影响延续至今。这种讨论之初主要针对的是现当代文学史，古代文学史并不在范围之内，但这并不是说古代文学已无剩义可发，对其研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尽管长期以来，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偏重于史的描述和单个作家、作品的评论，而缺

少多侧面的透视和总体的论述。文学史的编写体例已形成一种模式，一时难以突破”¹，但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学科的视角重新审视古代文学史依然是很多古代文史研究者不断努力的方向，比方说“文学的地域性以及文学家的地理分布”²在其时已经为研究者所注意。这应该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因为同时稍后，已经有人先后做过“唐诗地理、宋辽金词地理、金元明清剧作家地理、戏曲剧种地理、桐城文学地理”³等课题的研究，但胡阿祥教授《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一书出版后，文学地理研究较为详尽的理论体系才初次出现，而此书遂成为从地理学的视角研究古代文学的首部著作。

胡阿祥教授在该书引言“研究思路”一节对研究方法有所说明，指出除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进行表述以外，还要借助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如统计、制表、绘图之类，但文学地理立论的关键是要择定“能够代表文学发展状况的各类因子”，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文学家和文学作品两者。择定之后先“由文学作品入手确定文学家”，再通过考订所选文学家的籍贯制定其籍贯分布表及分布图，以展现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之后通过对图表的分析，认定文学发展程度的地域特点及相互差异，最后打通文史，“揭示各地区本土文学成长的历史背景与现实过

1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自序》，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此书80年代末首先是在台湾和香港出版的，可见对古代文学史的反思也大体在同时出现了，因此作者才会“尝试用概论的方式阐述中国文学”，期许“也许可以为读者提供若干新的视点”。引文见第1页。

2 见《中国文学概论》第三章“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第33—47页。

3 见卞孝萱为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所作序言。

程，分析影响文学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各地区的表现或作用”⁴。该书的主体部分就是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完成的。但作者本人对“魏晋文学地理”的构想不限于此，以上所为只是文学地理“静态”的一面，在该书“结语”部分，作者进一步指出了魏晋文学地理研究的另外两个方面：第一是与“静态”相对的“动态”的一面，即是“从文学家的流动来勾勒相关地区的文学局面，从文学家的集聚来研究文学活动中心的形成”⁵；第二是“分体文学地理”，即“通过文学作品的溯源、分类、统计及分区对比”，“显示分体文学地理”的基本事实，此举可在“观点和事实两个方面，补充与完善通过文学家所展开的研究”⁶。不过书中作者并未将这两点加以示范。需要指出的是，虽则上述研究思路看似是针对“魏晋”这一特定时段而言的，我们大可不必将其限定如此死板，实际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将此书所展示的研究方法适当地运用到其他时段的文学研究上去，亦当是作者应有之意，所以此书才会在“结语”最后附上“中国历史文学地理研究构想”⁷一节。而《籍贯与流动》正是将此种方法运用到北朝的一个例子。

在当下高校通行的文学史教材中，魏晋与北朝同在所谓“中古”时期“第三段”⁸这一大的时段内，但由于北朝的传世文学作品极为稀缺，致使“长期以来学者普遍认为北朝处于文学发展的低谷期”，“对其评价不是忽略不计就是挑选几个重点一笔带

4 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研究》，第4—7页。

5 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研究》，第161页。

6 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研究》，第168页。

7 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研究》，第173页。

8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之“总绪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过”⁹（第3页）。所谓“几个重点”，就是文学史书写中较多注重人物和作品，这种做法同时导致了对北朝文学的讨论重在北朝后期而忽略了其初期的文学状况，如果进一步探求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这种书写方式的弊端马上就会突显出来。¹⁰ 基于以上现实，《籍贯与流动》一改之前注重主要作家和文学作品的研究路数，打破了以往研究北朝文学的固定模式。一方面从地理学角度考察文士静态的籍贯分布；另一方面则分析他们动态的地理流动，通过对大量统计数据的定量分析，绘制成图、表以探讨北朝“文士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其变迁，文学与地域的关系，历史过程中文学的地域分布规律”。上述胡著中的理论与方法显然在这里有所体现，但只就北朝文学而言，确是具有“新视野、新方法”（第403页）的研究。而且在事实上该书研究思路与胡著也有

9 这种除了上引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之外，就个人单独完成的文学史著作而言，以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为例，该书涉及到北朝文学的有第十章“南北朝文学趋势”和第十一章“南北朝的诗歌”，但第十章立论的依据主要是南朝作品，所谓“文学趋势”基本上只是南朝文学的发展趋势；第十一章讲到了文学的具体类型，在此章上、下两篇中，对北朝的“民歌”以及“诗人”有所论述，但主要人物依然集中在所谓“北地三才”，而庾信所占的篇幅也相当有限。按刘著初版经1941年和1949年两次完成，50年代再版时“只在文字上”略有改动，“体制内容，仍如其旧”，60年代“又做了一些改动”，“通沟补漏”，试图“在规模上略求平衡”，此处用的是“平衡”后的版本，但以南北朝为例，显然带有“不平衡”的印记，可见北朝文学的“规模”确实难有扩充。以上关于该书版本的引文见“重版前记”和“新序”，第1—2页。

10 这种弊端在断代文学史著作中可能会有所消减，如曹道衡等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其在规模上自然超出通史中南北朝文学史的篇幅，但更重要的是其对北朝前后各个时间段内文学发展的状况都关照，不过依然未能超越以往文学史编写已有的体例与模式（观该书开头所附之“编写说明”可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不同之处：胡著在择定代表魏晋文学发展的因素时关注到了文学家和文学作品两个方面，二者相互补充，这样不但文学家更加名副其实，作者最终的结论观点也可以借文学作品得以佐证；《籍贯与流动》则迫于文献稀缺，只能选取“文学家”这一因子，这也是该书标题限定在“文士历史地理研究”的原因所在。另外，对“文学家”这一概念，作者的界定也较为宽松，是以“有文学有文采”的“文士”来代替的。具体说来，凡是史书本传中有“‘善属文’、‘有文才’、‘涉猎经史’之类的评价，或是史书行文中诗歌、文赋等记载，抑或是有文集记录者”（《绪论》第5—6页），都被视为文士，将之纳入统计范围。所以一方面该书对前人的研究思路有所借鉴，而且在此书中这种思路也得到了更为全面的展开和运用；另一方面由于时段的不同，该书在“文士”的择定上又显现了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虽只是在根本上由于北朝文学作品的缺乏所引起，但也正因此，界定及选取的文士群体典型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有所削弱；而北朝本土文学的特点能否根据这些文士的分布来分析，还需严肃对待。作者或许正因此重考虑，才未将书名定成“北朝本土文学地理研究”。

研究方法相似而研究重点或对象稍异，并不影响各自研究的价值。《籍贯与流动》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静态的“北朝文士的籍贯分布研究”（第12—284页），内容超过全书三分之二，是为全书主体部分，不但涉及“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三个北朝主要时间段内的文士，同时兼顾之前“十六国”和之后“隋初”的文士，上下贯通，可谓做了“穷源竟流”¹¹的工作。依照上述研究思路，作者对上列五个时段的士人籍贯分别

11 刘师培撰，程千帆、曹虹导读：《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4页。

做了统计分析，认为十六国时期文士分布以关陇、河西地区为多（第19页），至北魏则河北士人数量急剧增长，成为士人主要分布地，河淮地区，则位居第二（第66—67页）。然而北魏前后文士数量与地域分布，又各有不同。初期延续了十六国末期文学衰退的趋势（第53页），河北地区文士虽增加、关陇地区则依然相对较多；但随着北方割据的消失以及北魏汉化的逐步加强，后期北魏文士数量大幅增加，远远高出了前期，其地域分布则多集中在河北和河淮地区，可见孝文帝汉化改革对文学的重大影响（第147页）。

作者同时认为，东、西魏分裂后，北魏河北文士成为东魏文士的主体，再加上河东及河淮地区的文士一起成为东魏文士的主要组成部分。这种地域分布的特点，使得东魏成为北朝后期文学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第171页）；其后的北齐遂成为“北朝文学发展的高峰时期”。基于这一结论，作者进一步将东魏、北齐定为“隋唐文化渊源”之一（第188页），这是很有见地的论断；而与东魏、北齐文士的整体分布截然不同，作者通过统计分析，认为西魏文士主要处在河东地区，河淮、关陇依次排后（第196页）。若以554年江陵陷落为限分为前后两期，则又可发现西魏文士以关陇、河东地区为主，北周文士则河东与河淮占有主要地位（第229页）。据此分析，我们不但可以了解西魏北周文士地域分布的整体特点，也可感知由西魏到北周其间文士流动的大体趋势。作为上篇最后一节，作者通过对隋初文士籍贯的统计分析，指出隋初文士基本上继承了北周灭北齐之后的主要遗产，在籍贯构成上具有兼顾东西的特点，从而涵盖了北魏以来北方文学发展的主要成果，而真正文学意义上的南北融合就此从隋初开始了（第260—261页）。

以上是对《籍贯与流动》上篇内容的简单梳理，作者是据大量统计分析后才得出上述一系列的结论，工作相当精细，读者

切不可只关注结论而忽略其分析问题的思路与过程。另外，虽则作者本意是在上篇考察“静态”的籍贯分布，但若通观各个时段文士的地域分布，作者实际上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北朝文士籍贯分布变动的“动态”过程，这是不同于以往文学史书写的另一种景象。不但北朝文士的籍贯分布第一次于本书得到清晰展示，而且也验证了以往的某些研究成果：曹道衡等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即指出河北士人是奠定北朝文化发展基础的一支重要力量。¹²透过作者的分析，河北地区也确实确实是文士籍贯分布十分集中的地区，而且这现象几乎贯穿整个北朝时期。

作者通过对文士籍贯分布的统计分析，展示了北朝文士的籍贯分布特点，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北朝本土文学生态的一些特点。然而在事实上，文士不可能永居原籍，特别是动乱年代，在不同地域间流动更是常态，而京城又往往成为他们主要的目的地，作者认为这种以都城为中心的集中会对文学生态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考察了北朝文士籍贯的“静态”分布以后，在本书下篇，作者又专门对北朝文士的实际“动态”地理流动情况做了梳理。作者在兼及各个时段文士流动原因的同时，主要对这种流动现象以及其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北魏前期文士主要向平城移动，但这种移动还不是自发的，更多的还是政治因素的影响（第295页）。相比之下，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向洛阳流动的大量文士更多地是因自身需求而产生的自发行为（第295页）。大量文士聚集洛阳，使得洛阳的文学风气逐渐兴盛，标志着“北朝文学发展上的第一个高潮”的到来，在文学水平上也有追赶南朝之势。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进一步指出了北魏洛阳的文

12 曹道衡、沈玉成编著：《南北朝文学史》，第318页。

学风在北魏分裂之后多数转移至东魏北齐，为“北齐文学到北朝文学的巅峰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第327页），最终促成了“邺下文学集团在事实上的第二次出现”，“成就了北齐文学在北朝文学史上的地位”（第353页）。与东魏北齐在邺下形成文学集团相对，在西魏北周的文士也多汇集在长安，但作者指出长安的文学风气并不及邺下兴盛；到西魏末年南朝梁末文士流入长安后，其文学风气才逐渐显现，从而为北周文学的兴盛提供了基础（第354页）。而随着北齐灭亡以及隋朝建立，这些人又构成隋初文士的主要组成部分，成为理解隋初文学的重要依据（第382页）。

作者在下篇的分析，显然指出了北朝多个文士活动中心的形成，并勾画出从平城到洛阳至邺下，最后汇集长安这一文士流动的“动态”历程。文士活动中心的形成，自然对文学中心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不过，同样限于文学作品的稀缺，作者对这些中心文风的特点并没有进一步的分析。这理论无可否认于上述胡著中提到，却未及展开，在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践。而且作者所指出的“文学高潮”和“文学巅峰”，也正是文学史书写通常着墨最多的地方；作者的观点于此得到印证，其梳理亦显然较其他著作更为周全。

北朝文士籍贯的分布与文士流动而形成的活动中心，自成为一种历史现象。《籍贯与流动》首先是向我们清晰描绘了这一历史现象；同时也由于“文士”这一群体的特殊性，使得这种现象一方面能反映某种文学状况；同时也可能对文学发展产生影响。所以，该书的析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北朝的文学现象及其深层原因。

《籍贯与流动》一书研究视角与方法的特点，以及该书在学术上的意义，尤其是在北朝文学研究这一领域的开拓性尝试，上文已略有阐释。细心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或许会从书中得到另外

一些具体启发。最后，笔者不揣浅陋，就书中一二疏忽之处，略呈鄙见。语句不通，如“这些人多半是三世纪末四世纪初因为逃避宋繇”，此处似是“逃避战乱”，宋繇当与下文“敦煌人也”连接成句（第290页）；数据统计的疏忽，如东魏文士流动一节，作者指出“东魏文士80人中，有5人曾在邺城居住过，占总数的79.71%”（第337页）。此处“5”当为“60”，但计算结果又不是“79.71%”，不知何故；偶有衍字或错字，如“隋初文学基本上继承了北周灭北齐之后的主要遗产成”（第260页），“成”字当省，又“北魏前期文士向平城的集中并未是自发的”（第295页），“未”似应为“非”。

以上诸例，瑕不掩璧，对该书的整体表现没有什么影响，本书依然不失为一本优秀的学术著作。